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研究趋势与发展走向^{*}

——以近十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为视角

时培磊

【提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对于推动学科发展和深化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近10年(2010—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史的立项项目,可以发现该学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并创新性地进行了多角度、多视域的探索,中青年学者表现出很大的发展潜力。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规律和经验来看,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应该加强与时代的互动,培育学术新人,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并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关键词】 中国史学史 国家社科基金 时代特征 团队合作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史学,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总要总结某个时段的史学。近两年,对改革开放4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学进行总结的文章较多。其中,对历史学取得的重大成就最为关注,对其发展原因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入。除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和史学家自身主观因素外,学界对史学发展运行机制的认识也愈加重视,特别是看到了科研项目的带动作用。有研究称“国家社科基金每年数以百计的史学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等相继启动与实施,对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更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①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来讲,国家重要研究项目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本文以近10年(2010—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为视角,^②探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和发展趋势,并对学科发展提出一些思考。

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史学史立项的基本情况

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当下特别是在高校,科研项目的支撑作用尤为突出。有了项目,才易于汇聚学术队伍,才有助于产出高质量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其资助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权威性强,受到全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98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由全国哲学社会科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汉二元体制下的元代官方史学研究”(项目编号:17CZS053)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国历史研究院《新中国70年史学繁荣发展的历程与思考》,《光明日报》2019年9月9日。

^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统计的中国史学史立项,是广义的涉及中国史学史的项目,而非专指项目申请时的学科归属。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等学科立项中,都可能出现史学史的内容。这个统计,是从有益于中国史学史学术发展的角度考虑,学科交叉性质的项目有时更能促进本学科的创新。

学规划领导小组代行基金委员会职责,组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副组长为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基金委员会主要负责审定基金管理方法和批准申请项目,并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等16个学科基金组。基金委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代行其职。^①1991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8年改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专门负责管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目前,国家社科基金已形成包括重大项目、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单列学科项目、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成果文库等多个类别的资助体系,并分设哲学等23个学科类别和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3个单列学科进行申报和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的数量和级别能够充分反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能力和综合实力,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中国史学史的学者主要分布在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其中高校系统人数最多,对国家社科基金也最为重视。通过分析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可以把握史学史研究的主流和趋势,对于探究学科发展动力也有一定意义。

通过梳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历年各类别项目立项名单,以及查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笔者统计近10年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立项总数为192项,几乎涉及除单列学科以外的各个类别,重点分布在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中。各类别分布情况如下。

表1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史立项数目统计表(2010—2019年)

	重大	重点	一般	青年	西部	后期	外译	冷门	文库	合计
2010	1	0	3	3	0	3	0	无	0	10
2011	1	0	4	4	2	4	0		1	16
2012	2	1	4	5	2	3	0		1	18
2013	1	0	9	4	5	2	1		0	22
2014	1	0	3	4	1	4	1		0	14
2015	1	0	6	5	4	4	2		0	22
2016	1	1	7	9	3	4	1		0	26
2017	1	1	5	2	1	4	0		0	14
2018	2	1	10	0	5	5	0	0	0	23
2019	2	2	7	7	0	5	1	2	1	27
合计	13	6	58	43	23	38	6	2	3	192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启动于2018年,故之前都没有立项。根据对中国史学史立项情况的统计,可以对整体情况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近10年中国史学史平均每年立项约为19项。2010年立项最少,仅10项;2014年和2017年数量偏少,均为14项;2019年最多,达27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的立项数量年度分布不均,或者说存在大小年的特点。

2. 表1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每年都有立项,但立项者并不都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者,而且也不都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史题目。如2012年张帆的“《元典章》校释与研究”、2013年南炳文的“《明实录》整理与研究”等重大项目都是对史籍的整理和研究,属于文献学、断代史和史学史交叉

^① 安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简况》,《中国科学基金》1989年第4期。

学科的研究项目。2010年周少川的“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1911—2011)”也是文献学、史学史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项目。近年来,这种情况明显改观,如2017年王学典的“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2018年胡逢祥的“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900—1949)”、2019年于沛的“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等,都属于较为典型的史学史学科项目。

3. 近10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呈稳步上升趋势,但是中国史学史立项数量有升有降,没有出现明显随之上升的趋势。从表2对年度项目的数据统计即可看出这种特点。

表2 中国史学史年度项目(重点、一般和青年)立项数量对照表(2010—2019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国史学史	6	8	10	13	7	11	17	8	11	16
总立项	2285	2883	3291	3826	3818	3777	3917	4289	4506	4627

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年龄限制发生过较大调整,从2014年开始青年项目申报人的年龄从39周岁调低到35周岁,所以2014年和2013年的立项相比,一般项目立项增加了442项(2023→2465),而青年项目则减少了487项(1531→1044),削减了近1/3。但中国史学史的立项情况与之不同,2014年与2013年相比,青年项目都是4项,一般项目却减少了6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青年学者受政策调整的影响较小,青年项目立项数量总体保持稳定;但也体现出研究队伍体量小,总体变化不大,甚至可以说在其他学科增长的同时,本学科发展较为缓慢。

5. 据统计,国家社科基金近10年年度项目中各类别的立项占比大约为:重点项目10%、一般项目60%、青年项目30%。但是,中国史学史三类立项数分别为6、58、43,其占比约为5.6%、54.2%、40.2%,呈现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青年项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反映出中国史学史学者中青年项目的立项率更高一些。

6. 从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史的立项单位分布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居于首位(13项),体现了国家级综合性研究单位雄厚的科研实力;其余均为高校所获得,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立项最多(12项),山东大学(9项)和华东师范大学(8项)紧随其后。北京师范大学拥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史学史学科中是全国唯一的。由白寿彝开创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成为北师大最具影响力的学科之一,老中青研究队伍齐整,主办《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等CSSCI来源期刊(集刊),每年召开重要学术会议,学术交流活跃,出版大量专著和论文,是国内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镇。山东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也是史学史学科实力雄厚的高校。此外,还有101家单位获得了中国史学史的立项,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在全国的分布具有一定广泛性。

7.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是体现学者个人学术水平和能力的一种方式,高校在职称评审和工作绩效评价等方面都愈加重视科研项目,所以获得立项也是学者获得学术界和工作单位认可的一种体现。因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周期较长,基础研究项目一般需要3—5年,所以能够连续获得立项比较困难。近10年获得2项及以上立项的中国史学史学者有王学典、钱茂伟等8人,其中获得重大项目的难度最大,也体现出主持人的学术地位和研究团队的综合实力。当然,在10年内获得1项立项的,可能在本研究区间之前也获得立项,同样具有很强的实力。

8. 国家社科基金是目前中国最高级别的社科类科研项目,获得立项的难度较大,一般各省和各

单位实施限额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分为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最终总的立项率在 13.5% 左右。除个别高校外,中国史学史学科在高校属于比较弱势的学科,能够通过校内和省内的评审推荐到国家通讯评审阶段已属不易,而会议评审专家中专门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者也不多。虽无法准确统计,但中国史学史的立项率应该不会太高。另外,国家社科基金还专门设立重大研究专项或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史学史学者也偶有获得立项者,如瞿林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总体上看,中国史学史立项数量并不多,近 10 年年度立项数约占中国史类的 1/20。这与中国史学史二级学科在中国史一级学科中体量不大有关,还与学者们对项目的认识有关。如,一些著名教授认为并不需要这种项目来提升自己,不喜欢计划或程式化的研究,而是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自身学术发展规划来做研究,更加看重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学术声誉。很多高校对教授的考核并不只关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其他来源(如教育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研究项目也予以相当重视。但是,就运行机制、立项级别和覆盖面广度而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仍然是最具影响和最受关注的。

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多角度呈现与青年学者的涌现

根据国家社科基金管理规定,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着力推出体现国家水准的研究成果。基础研究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前沿动态,着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中国史学史的立项项目基本属于基础研究,通过对这些项目的分析,可以找到一些研究特点和规律。

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词频分析的方法。本文也对近 10 年立项的中国史学史课题题目进行词频分析,剔除虚词和意义较为宽泛的高频词,然后对结果进行统计,并利用“图悦”词频分析软件制作出热词权重图。在图 1 中,词的字号越大表示权重越大,也即研究的热点领域和问题。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 1 中国史学史立项热词权重图

显而易见,“史学”是图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说明中国史学史学科立项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以史学为研究对象,学科特点鲜明。在时段上,“民国”出现频率较高,说明中国史学史立项项目对近代史学问题的研究较多。当然,限于分词软件的工具性,有些特点没有被分析出来,只能通过手动方式进行排列和研究。另外,史学史学科与其他学科存在很多交叉研究点,很难绝对分清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属于哪个学科,或有前列立项统计表难以判断分类或遗漏者。通过对统计出的近10年中国史学史立项项目的综合梳理,可以发现有两大特点:一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二是青年学者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 中国史学史的立项课题既体现了对传统研究范式和研究热点问题的坚守,又呈现出多种角度的新探索

第一,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和长期关注的热点仍在立项中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也体现出这一特点。近10年中,8项立项题目中直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字眼,其他项目中涉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的研究也有不少,唯物史观的研究也很受重视。从研究角度看,既有探讨近现代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刘大年、张舜徽等)、学术机构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关系的研究,也有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研究,还有开展较大规模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

对于一些重要史书、史家和史学机构的研究仍然热度不减,如关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课题就有4项,分别从学术话语、学术体制、学术范式、学术发展等角度进行研究。传统史学史研究中关于史论、史评方面的课题仍有不少立项,如2011年白云的“中国史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型”、2014年申慧青的“史学家视野下的宋代君主论研究”、2015年张宇的“宋代历史评论研究”、2016年刘开军的“清代中期史学批评研究”等。

第二,中国史学史的立项课题体现出对基础文献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的重视。这也符合国家社科基金侧重基础研究的特点,特别是在对重大项目的支持上更为明显。如,重大项目有2018年胡逢祥的“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900—1949)”、2013年南炳文的“《明实录》整理与研究”等,年度项目有王嘉川的“《史通》文献集成与研究”、苏芑的“古写本《史记》《汉书》残卷的蒐辑、校证与研究”等,后期资助项目有王学典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等。这些研究项目,既有对传统文献的系统梳理,也有对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都属于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铺路架桥的作用。在立项项目上的重视,体现出国家项目在倾向于支持前沿性探究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导向。

第三,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宽。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要求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近10年中国史学史的立项课题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如2019年李帆的“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中华民族认同研究”就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时代要求下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体现。新角度、新视域是很多立项课题创新意识的体现,如段润秀的“文化认同视角下的清代《明史》修纂研究”、舒习龙的“史学学人日记视阈下近代史学转型与表征研究”等项目,都另辟蹊径,进行史学史“老问题”的新研究。

同时,对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在立项课题中也体现出来。如,在东亚视野下进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孙卫国的两项课题都主攻这一方向,分别是2013年的“中韩(朝)古代史学之交流与比较研究”和2019年的“东亚视野下万历朝鲜之役研究”。2019年宗亮的“明清官修史书在越南的流传与影响

研究”将研究领域拓展至越南史学。2014年陈安民的“王夫之与维柯的史学思想研究”、赵少峰的“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19)”、2015年张峰的“中外史学交流视野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范式与成就探析”都将研究视野放于中西史学交流和比较的范围。正如乔治忠曾呼吁,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需要主动地放开视域,不能将考察空间局限在现在中国领域的范围之内,即需要在东亚的视域下进行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史的研究,并加上关于中西史学交流及史学比较的探索。这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持续、健康与深入,更具有迫切性”。^①这在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中已经呈现出很好的发展势头。

国家社科基金中专门设立了西部项目,主要关注西部开发、民族团结、宗教政策、国家统一等宏观问题,也强调要研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和建设区域优势学科。在中国史学史立项项目中就有不少关注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少数民族取得的史学成就,以及少数民族的史家、史籍等问题,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研究《蒙古秘史》和若干种藏文史籍的课题,以及王伏平2015年的项目“回族史学史研究”。年度项目中也有如2010年叶拉太的一般项目“藏族古代史论遗产的发掘与整理研究”、2011年吾斯曼江·亚库甫的青年项目“16至19世纪维吾尔族史学史研究”等。

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双轨运行机制,近10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就有不少从官方史学及其与私家史学互动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的项目。如2013年王盛恩的“宋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关系探析”、2017年时培磊的“蒙汉二元体制下的元代官方史学研究”、2019年聂激萌的“汉魏六朝文书行政体系中的官修史研究”等。

(二) 青年学者的项目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亮点

在中国史学史近10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中,青年项目所占的比重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国史学史学科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青年学者的立项多与其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密切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书中特别设立“与博士论文的关系”一栏,意在重视博士论文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在结项时也要求与博士论文有明显区别,强调要有继续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后期资助项目,规定博士毕业两年后才可申报,同时要求对博士论文做出较大修改。2019年新增规定允许获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者当年即可申报,并设立专项资助。可以说,博士论文是大多数学者在学术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基石,基本是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的对最前沿学术问题的研究,所以以此为基础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比较顺利。

梳理发现,中国史学史青年学者在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中,有一半左右的课题都与自己的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有密切的学术联系,通过国家社科基金的进一步提升,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新的学术亮点。如聊城大学赵少峰2014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19)”就是在其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西史东渐与晚清史学演进》基础上获得的,结项之后于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27)》,并由聊城大学联合商务印书馆专门召开了新书发布会和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界也产生了重要反响。乔治忠认为该书“充盈着问题意识、史料搜讨与精慎考析,在诸多同类著述中值得特别关注”。^②2020年,该书获得山东省第34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① 乔治忠《东亚视野下的历史研究——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东亚视域》,《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

^② 乔治忠《问题意识、史料搜讨与探索空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15日。

再如,四川师范大学刘开军2016年的一般项目“清代中期史学批评研究”,即是在其博士论文《乾嘉考史学家的正史批评》基础上申报成功的;陕西师范大学邓锐2015年的后期资助项目“宋代《春秋》学与史学关系研究”是以前述博士论文《〈春秋〉学与宋代史学》为基础申报的;商丘师范学院张雷2012年的青年项目“20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是依托其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的演进》而申报成功;曲阜师范大学朱茱丽2019年的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唯物史观派中国原始社会研究之反思”,也与其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探微》紧密相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枚举。

可以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帮助许多青年学者走到了学术舞台的中央,不仅成为工作单位重点培养的对象,也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队伍中的后起之秀。他们为学科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带来了许多新颖的研究视角,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突破。

三、关于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

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和学科发展问题,不少学术研讨会将此作为会议主题之一,一些著名学术刊物也纷纷组织学术笔谈或发表专题论文,共同探讨和研究这个时代课题。^①从近10年中国史学史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视角,可以略窥该学科的研究趋势和发展走向,也能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提供一些思考路径。笔得拟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拓宽和学科队伍建设两个维度略陈管见。

(一) 从中国史学史学术研究深化的角度来看,应该重视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跨学科交叉和综合性研究是新趋势。随着当今学科发展的迅速推进,各学科之间打破壁垒进行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与综合性研究日趋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中国史学史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学科,在清理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中,就与文献学、专门史和断代史有很多的交叉点,各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参与进来。例如,前述所列各年度重大项目,进行《明实录》《元史》《元典章》等史籍点校、整理和研究的项目,大多是融合了史学史和文献学等相关学科而进行的综合性研究;2011年吴漫的一般项目“明代水利文献研究”也具有此种特点。

除了历史学本身的二级或三级学科以外,中国史学史的立项项目也有其他相近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参与,特别是与文学、哲学、艺术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有不少结合点,甚至还有和建筑学等

^① 《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组织刊发4篇文章专题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其中乔治忠从学术研究的切入点、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等构成层次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史学范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朱政惠提出要从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刊登了一组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问题的笔谈文章,瞿林东、乔治忠、胡逢祥、王记录、杨艳秋、李振宏等学者从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中外史学比较、研究范式、发展趋势等多个角度提出了新见。瞿林东《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提出关注理论研究、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等问题,以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于传承中有所发展和创新。陈其泰《关于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提出应当着力探讨中国史学史演进中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如重视运用“文化视角”、重视贯通研究等。此外,乔治忠《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4期)、赵梅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赵梅春《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的变迁》(《郑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姜萌《范式转移与继往开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一百年》(《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等文章总结不同时段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了展望。张越《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位置与研究框架》(《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赵梅春《中国史学史学科新体系的建立及其影响》(《河北学刊》2020年第2期)等文章从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

自然科学结合的项目。如 2012 年商丘师范学院法学系张雷的青年项目“20 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是一项法律史学史的研究项目;2019 年东南大学艺术学李倍雷的重点项目“《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体系与相关问题研究”是从艺术史角度探究史学史的项目。

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已经被很多其他学科学者借鉴,出现了诸如文学史学史、哲学史学史、法律史学史、翻译史学史、建筑史学史等多种著作,还有专门研究电影史学史的博士论文。^①2017 年 10 月,中国音乐史学会和温州大学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对中国音乐史学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范式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研讨,并推出了系列成果。^②可以想见,在目前比较重要的历史学专史研究中,也必将出现新的史学史学术增长点,如社会史学史、环境史学史、医疗史学史等。史学史学科除了在自身内部挖掘新题目、新方向以增加内生动力外,还应该秉持开放的心态,既让其他学科的人积极参与进来,又要主动参与到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去,从而借助外力找到新的学科增长点。每一门学科,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有自己学科的历史,特别是一些发展历史较长的学科,都需要进行学科史的梳理和总结,这就需要发挥史学史的学科特长,从中找到结合点,使之成为史学史学科新的增长点。随着各个学科对史学史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增强,对史学史研究方法的不断吸收借鉴,其他学科与史学史的结合点以及史学史学科自身的学术增长点也会越来越多。

第二,体现时代特征是新的增长动能。从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来讲,它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还要与社会进行广泛的结合。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要求提出要体现时代特征,从已经立项的项目中就能看出这一特点。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际交流(“一带一路”倡议)、话语体系等理念。中国史学史的立项中也有相应的研究,如 2016 年李帆的重点项目“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中华民族认同研究”、叶建的一般项目“近代中国唯物史观史学话语建构研究”、曹小文的一般项目“中国世界史书写与话语变迁研究”、童杰的青年项目“明代海防文献研究”2017 年刘承军的一般项目“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史料学派学术话语的建立’”,2018 年颜克成的西部项目“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史编纂与民族国家建构研究(1931—1945)”,钱云的后期资助项目“从‘四夷到‘外国’《宋史·外国传》研究”2019 年杜慧月的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中国历代使朝鲜录整理与研究”,等等。这些项目或多或少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都与国家政策、时代潮流和学术体系有着密切联系。

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来讲,其与时代的共振和社会的互动是传统之一,也是能够推动其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讲,如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伟大工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问题。因此,关注时代主题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值得重视的问题,也是寻找新学科增长点的方向。正如瞿林东所言“在时代孕育史学和史学滋养时代的辩证关系中,积两千多年的发展,我国史学逐渐形成自身的优良传统,如人本主义传统、史学审美传统、史家修养传统等。这些优良传统,经历代史学家的阐发不断丰富了原有的内涵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当下,我们要从时代与史学的互动中推动我国史学发展,尤其要注意弘扬追求信史、经世致用和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 黄鹏《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纲要》,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 年。

② 洛秦《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的意义——研究属性、观念、范畴和范式的思考》,《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

忧患意识三个传统。”^①因此,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研究要致力于响应时代的呼唤,从国家和社会需求的角度反思自身的研究,不回避现实,不逃避问题,从与时代的互动中找到学科发展新的增长动能。

(二)从中国史学史学科队伍的建设来讲,应该从以下两点着手

第一 加强团队合作,形成学科发展合力。从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大部分是靠单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完成的项目,需要团队合作完成的大型项目并不多,特别是跨单位多家合作完成的项目更少。2017年王学典的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则是比较典型的多家单位合作开展的项目。该课题着眼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力求完整准确地展现百年史学的演变大势、整体风貌和基本特点,属于需要团队合作完成的工作量极大的项目。该项目课题组成员除山东大学陈峰、郭震旦外,还有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北京师范大学张越、台湾东华大学蒋竹山等,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队伍的合作。大项目的支撑和大团队的协作往往能够推动学科发展,如国家《清史》纂修项目,就推动了国内清史研究队伍的迅速壮大和清史学科的蓬勃发展。

中国史学史学科很难形成团队,一个方面是因为学术队伍较小,一些学者往往被拉入本单位的其他学科队伍中去,久而久之学科意识逐渐淡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单打独斗”容易迅速出成绩,而团队项目耗时长、见效慢,团队成员的成绩很难得到评价部门的认可,因此除了师承关系的团队以外,其他合作往往很难长久。但是,从长远来看,大型科研项目既有利于学科发展,也可以促进个人成长。比如,历史地理学界向来有“任务带动学科”的传统,邹逸麟就曾说“大型项目对学科发展非常重要。第一,可以出大成果,基础性的成果,不是一个人一篇文章一本书。第二,更重要的是培养一支队伍。中国的大型科学研究都会培养一支队伍。”^②中国史学史学科没有成立专门的学会组织,仅靠每年各个单位召开学术研讨会的方式来加强联系,所以学科团队意识并不强。因此,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的资助下,可以整合国内的团队力量,加强合作,使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者在团队合作中共同成长。

第二 培养青年人才,为学科发展蓄力。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需要完整的研究团队,既要有学术领军人物,也要有青年后备人才。近10年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既有获得重大项目的著名教授,也有一批获得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学术中坚力量,还有诸多获得青年项目的后备力量,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青年项目在年度项目中所占的比重超过国家社科基金的平均值,显示出中国史学史青年学者的研究活力和发展后劲。

但也应该看到,在全国历史学青年学者队伍中,中国史学史学者的活跃程度和知名度仍然不如其他学科。比如,教育部从2015年开始设立青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重点支持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恪守学术道德和教师职业道德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自然科学38周岁以下,人文社科45周岁以下),历史学科每年入选4人,目前已公布的12人中,^③无一人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方向的研究。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整体发展来讲,要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才能为学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继力量。在这方面,史学史学界的老前辈堪称楷模。早在1991年白

① 瞿林东《与时代互动是史学发展的动力》,《人民日报》2015年5月4日。

② 段伟《集体项目既出成果也出人才——访邹逸麟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4期。

③ 每一年度长江学者名单都于下一年公布。2018年教育部公布了新修订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但2019年未在网
上公布2018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名单,故笔者未获知全部名单信息,文中仅统计了2015、2016和2017三个年度的数据。

寿彝谈《史学史研究》创刊30周年时就指出“过去还有一个想法,史学史是个新型学科,文章不多,所以对新作者尽量照顾。这一点,今后应该坚持,不过在质量上要求不断提高。新作者的新见解、新材料,我们是欢迎的。”^①可以说,白寿彝不仅尽心培养北师大的年轻人,为该校的史学史学科蓄积了大批学术人才,而且通过《史学史研究》这个刊物提携和培养了全国史学史学术新人,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2011年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后,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成为中国史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归属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史学史学科点应适时进行调整,不断提升人才梯队培养和建设的质量。特别是有条件的高校应该抓住本硕博一体化培养的机会,为中国史学史学科提早储备年轻力量。对于青年人才的培养,也应该通过导师团队、学科组、教研室、研究所、研究中心等平台进行集体科研活动,并注重学术基础的铺垫和研究技能的提升。乔治忠指出,史学史学科要培养更加精良的专业人才,“要有一批掌握特殊治史技能的学者,诸如甲骨学、金文、古代音韵、满文、蒙古文等领域,至少要有的一些初入门径之人,非此不容易对相应专业的史学著述予以评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不可缺少各种人才的培养,这需要有目标地培养各有专长的研究者。在整个史学史学术队伍中,只有人才技艺基本齐备,且能协同合作,史学史的学科地位才能达到应有的高度”。^②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青年学者要注重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2018年开始启动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其支持力度相当于年度项目中的重点项目,对于掌握一些特殊治史技能的中国史学史青年学者来讲必将大有可为。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并不能代表中国史学史学术研究的全貌,由于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是否获得项目也并不能完全反映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低。一些没有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学者,依然积极投身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史项目的分析虽有局限,但对推动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文只是由此一点略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趋势和学科发展问题。推动学科发展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国家社科基金只是其中的一项外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化和学科体系建设仍然需要学术界的继续思考和深入研讨。

(作者时培磊,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邮编:065000)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廉敏)

① 白寿彝《这三十年》,《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

② 乔治忠《谈谈中国史学史的要务及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9日。

ethnic groups in surrounding regions. All-under-Heaven more stre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governance between the center and peripheries. The “Grand Unity” speaks more about how the empire establishes its legitimacy in both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senses. Therefore, by grasping the three concepts as a whole, we can establish a panoramic view of Chinese history.

The Rules of Rise and Fall: A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 Zhu Hu

In Qing history,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is always regarded as the turning point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In terms of the nature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his change, scholars usually hold three types of view, including the dynasty cycl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atter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Yet all these three models have limitations, and they cannot accurately portray the comprehensive scope of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In an attempt to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 we should change perspectives and reorient problem consciousness. Adopting an approach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practice, we should rethink the standard of “change” in this period, grasp the thread of the “change” with integrated thinking, and identify the overall pattern of the “change” through a holistic view. By doing so, it will help us to stay away from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pitfalls in our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A Scholarly Review of Several General Histor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Yu Heping

Speaking about several published general histor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e may argue that the editors, contributors and some readers have offered various views on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 historical content, and analogical frameworks. They attempt to include all the aspects and write history holistically. Yet in practice, each book has its own priority. To just name a few, some write a political history, some offer a general narrativ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some frame the modernization as the story line, some tell a generalized history, and others argue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ach approach displays some unique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y cannot be simply praised or criticized. However, for a general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s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o show how the Republican period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dynasties, which requires more than one story line.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eriod: short, chaotic, foreign, new, and recent.

The Tren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Studi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An Assessment of Approved Projects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 Shi Peilei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is currently the highest-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nd it has bee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disciplines and furthering academic research. By sorting out the projects funded by this 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past decade (2010 – 2019), this article has identified the trends of scholarly development of this period, one of which is to pursue innovations through various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Young and middle-aged scholars have exhibited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Judged by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foundation, we may argue that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hould follow the

trends of times , enhance collaboration of research , and actively explor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n combination with various methods.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Little People” in Carlo Ginzburg’s Research // Zhang Xiaomin

Microhistorian Carlo Ginzburg studies “little people ,” and this is his uniqu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In terms of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 Ginzburg emphasizes the change of individual images within the group , which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influenc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the trend of global history turn.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of research , he pays attention to little people’s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 he uses clue paradigms to explore details ,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ontext associated with clues. The emergence of the above research features depends on the sophisticated use of some neg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 especially court trial records. It is a complementary way in which historians look at these cases and court evidence as judges treat testimony. In doing so , they will provide multiple layers of historical evidence to study “little people” in the future.

The Origins , Practice ,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Historical Studies in Japan // Kang Hao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historical studies in Japan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indigenous scholarly tradition. Scholars , such as Mizushima Tsukasa , Haneda Masashi , Akita Shigeruare , the pioneers and promoters of global history , and with their efforts , the Japanese study of global history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its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 it is the influence 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the other hand , it is the Japanese tradition of studying Japan-Europe comparison , intra-Asian trade , Maritime Asian history , and Eastern Eurasian history , known as the so-called “Asian perspective. ” Thus , one of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historical studies in Japan is the focus on the Asian continent and Asian ocean sphere , an emphasis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Asian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 Zhou Fen , Zhang Shunhong

There is a tendency to generalize the concepts “empire” and “imperialism” in world-historical studies. In order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world-historical development ,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mpires are generally not the large territorial state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times that normally came into being through gradual interaction and amalgamation of small states or kingdoms. “Empire” should specifically refer to the ones established mainly by western powers through overseas colonial expansion since the late fifteenth century. Imperialism belongs to capitalism , and does not exist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times. Imperialism has two layers of meaning: primarily , it refers to the monopoly stage of capitalism; it can also refer to the policies , behaviors , and propositions of capitalist powers in pursuit of colonies and hegemony. Some scholars in the West today have a strong ideological bias towards China when they use the concepts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Chinese historians should clearly define and accurately use such concepts , in order to develop a scientific discourse through which to raise the impact of China’s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